

Column

■长短集

五位一体

科学发展观落实手段的经济学内涵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然涉及落实的手段是什么。笔者此处不做概念性探讨,仅从经济实践角度来分析。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已给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手段提供了具体内容,即在坚持统筹兼顾基础上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位一体。从经济学内涵上看,统筹兼顾和五位一体的手段被嵌入在不同的经济实践问题之中。国民经济是一个层级式的发展系统,体现为企业发展系统、产业发展系统、区域发展系统和国家发展系统四个层级,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手段正可以循此内化到不同发展系统层级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之中。

第一个层级是企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突出问题,这里的非均衡性不是指企业之间收益水平的差异,而是强调企业发展机会的不均衡性。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水平还比较低,政府在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退出。比如,按有关促进企业发展的支持性政策和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往往是保护重点,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则被排斥在外。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企业不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规划之中,但综观国内外发展实践,仅仅依靠扶持和保护措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企业达到高竞争力水平呢?其实,除了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凡是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企业,就应当具有同样的发展机会。通过加速市场化水平促使企业的均衡发展,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也是在微观层面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

第二个层级是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立足在这样的基点,此处所谈的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相对于产业的融合化而言的,特指产业链条的断裂和产业体系的自我封闭化发展状态。发展经济学有个著名的二元结构理论,即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结构。许多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弥合二元结构。然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又出现了快速成长,但拉力较弱

在当今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虽然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但所得份额非常少,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广大劳动者所分享的更少。面对如此严峻的发展形势,有学者提出了新开放观的发展理念:开放中的效益增长、开放中的制度优化、开放中的创新发展。

的信息部门与缓慢前行的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新二元结构。要想尽快地弥合这种新、老二元结构,就必须借助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的力量。一般而言,提高信息化水平,将为传统产业调整改造提供有效的途径。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联系,融合效应非常明显,传统产业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进入传统产业,则造成了生产过程、工艺流程、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促进传统产业发生质的转变。由此看来,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确保国民又好又快发展的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化促使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形成,还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这本身就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基本内涵。

第三个层级涉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调整了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开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宏观调控以后,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进入新千年以来,尽管中央政府为了区域均衡发展下了很大功夫,但实际成效并不佳。这是因为,一旦一个区域进入了停滞发展或欠发展的区间后,与之相连的市场条件、制度环境、思想观念都会陷入到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怪圈之中。要打破这一怪圈,就需要加速区域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是与其工业化程度在全国份额的扩张和收缩有着极为密切的正向关联性。这表明,加速工业化依旧是振兴国民经济、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选择之一。此外,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城乡差距问题,即农村人均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巨大鸿沟。因此,按照工业化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承受能力,适时推动城镇化进程,就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另一现实选择。

第四个层级触及到国家发展的非均衡性,快速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可以消除这种非均衡性的程度。原因很简单,当今,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差距,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贸易竞争力持续保持高位。在这种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虽然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但所分享到的份额非常少,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广大劳动者所分享的份额更少。比如,珠江三角洲工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中就没有得到提高。面对如此严峻的发展形势,有学者提出了新开放观的发展理念。在笔者看来,新开放观是中国现阶段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开放中的效益增长、开放中的制度优化、开放中的创新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手段之一,也是切实实现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手段。



■失在弦上

天使的一半是魔鬼

——公司制的大漏洞

◎张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企业制度演进到公司制尤其是上市公司无疑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它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公司固有的制度漏洞所带来的,正所谓天使的一半是魔鬼。

许多人可能对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的倾覆还记忆犹新。安然公司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天然气经销商,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和出售商、世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世界领先的能源批发做市商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在这一转变中,安然的销售收入也从1991年的135亿美元增长到10年后的1008亿美元,公司股价从每股21美元最高上涨到90美元,市场价值曾超过800亿美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是美国最受尊敬、最具创新精神的上市公司却在2001年12月2日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公司股票价格也跌到1美元以下,并最终被纽约证券交易所除名。

其实,安然公司的崩溃,是公司制的制度漏洞的集中暴露。

现代公司制度是适应社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实现了资产形成、运作及其评价的社会化、市场化,资产管理的专业化、市场化,保证和推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因而成为现代企业的最好实现形式。但公司制有个最大制度漏洞,它使一部分人获得了拿到别人财产去冒险的可能,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这种制度漏洞源于公司企业中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由此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从历史经验看,现代企业的财产关系之所以采取委托——代理方式,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经济学中所说的“分工效果”和“规模经济”。但这种经济效益是以代理人忠实地为委托人服务为前提的。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目标可能不一致,代理人作为“经济人”还存在所谓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代理过程中产生职务怠慢、机会或侵蚀委托人利益等“道德风险”。加上上市公司股权分散、流动性高,股东发言权有限或对公司经营行为无兴趣,即使企业经营不善,也不会干预公司经营,只是用脚投票,由此必然导致所有者对经理人员监督约束的弱化,使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具有现实可能性。2001年以来,美国安然、世界通信、施

■排沙简金

走,去投资全球最有价值公司!

◎王育琨
管理专家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没有人会想到,美国次贷危机的接盘手竟是省吃俭用的中国人。向巴菲特学习,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救援遭受地震大灾的四川,捐款总数已超过100亿元。可是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个数字比起中国给美国次贷危机买单的数额,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美国金融体系的成功,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华尔街的翘楚们感觉无所不能,富人的钱赚足了,又开始打量那些穷人。明知穷人还不起贷款也向他们放贷,对这些不属于“优质债”的“次级债”,又打包证券化,转手卖出去。先本金贷款(Interest Only)、债务抵押债券(CDO)、信用违约交换(CDS)等等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把真实的住房需求已经篡改得面目全非了。结果使他们偏离了一个接一个的真实。

美国次贷危机加深,正是对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美国金融体系的惩罚。瞬间倒闭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是有着85年历史的投行,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金、经验、模式、创新工具等等,可以熟练掌握各种大势和本质。可是,庞大的已知,非但没有拯救它于水火,反而让它痴迷于扭曲人性和需求的数字。

起初,中国人暗自庆幸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中国银行业也没有被卷入次贷危机,盈利依然强劲。可是,突然跑出一个经济学家张化桥,他言之凿凿地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埋单者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庞大美元储备。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美国正在加紧印制新钞票,中国拱手向华盛顿交“通货膨胀税”或“铸币税”,接盘次贷危机!张化桥:“重商主义之祸”。

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在美元霸权下,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却成了美国投机者贪婪吞噬的唐僧肉。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固守着千年古训,省吃俭用,多生产,少进口,多积累,少消费,多攒美元,少花美元,结果到头来却要美国的通货膨胀买单!而且,一边谦和地堆起笑脸纳贡,一边还要承受对方的傲慢和谩骂!这就是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经济体系:谁执掌了金融的牛耳,谁就执掌了世界。这悲壮的一课,将给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全球化早已不再是概念上的说辞了,全球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无论是有意地参与还是无意识地被卷入,都要在这个体系内各取所得。中国人不能再被动下去了,中国人如果不去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如果继续那种相对封闭的经济思维,我们将继续做冤大头。

在美国金融业深陷次贷危机不能自拔之际,股神“沃伦·巴菲特”则重登美国富豪榜榜首。巴菲特长期不看好美元。在过去6年中,他大举做空美元。自2002年以来,巴菲特通过期货合约及其他投资建立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尽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他做空美元的理由是基于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自2002年初以来,欧元兑美元已累计升值75%。

在5月3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面对当天到场的约3.1万股东预言,美元还要贬值10年以上。巴菲特幽默地说:如果我今天带着亿万火量货币登陆火星,我肯定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元”。巴菲特把手中的美元都买了公司。买那些能赚外汇的公司,买资源型公司,买中国、印度的公司。去年

巴菲特买中石油大赚30多亿美元,他那天表示,等价格合理时还要买进。

中国投资界现在有很多人以巴菲特为榜样,那就先跟巴菲特学这招吧,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只是单纯抛售美元,可能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最终受损害的还是中国。而把美元转换成全球有价值的公司的股份,则是不错的选择。对一个资源并不充裕的大国来说,把这些美元外汇储备转变成沃尔玛、苹果、惠普、IBM、思科、力拓、必和必拓、摩根大通、高盛、瑞银等一流消费类公司和资源型公司的股权,可能具有更多价值。

如山的外汇储备是祸,更是福: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现在不愁货币资本,这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坚强后盾。经济30年高速增长,巨大市场的庞大订单,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最好通行证。大型资源型公司,一流消费类和制造业品牌,特别想分享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公司正可以投其所好,凭借手中的订单,反向投资其母公司。当然,最大的优势还是3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和精神。

先知先觉者还是中国企业家,已经凭借去海外去买资产、买公司走向了全球化的舞台。华为、中兴、联想、TCL等等走出去办公司和并购公司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路径。中铝、中投、工商银行等投资海外有实力大公司的股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毫不奇怪,短期内摔跤、付学费都是正常的。

走,出去投资全球最有价值公司,我们才有可能摆脱为美国危机埋单的宿命!

■新垦地

“是,普京总理阁下!”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梅普组合”执掌俄罗斯后的第一周,普京的第一项决定是重塑新政府权力架构和人事任免,俄各大报刊和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对普京此举予以详细报道,而梅德维杰夫虽然也在同一天发布了总统府的重要人事任免,但却只是被放在了二版。

按照惯例,总理的这项决定必须呈交总统并获得批准,俄罗斯电视台也直播了普京与梅德维杰夫各就各位一周后双方的第一次会商场面。尽管两人身份转换了,但会晤本身却没有任何改变:普京仍坐在属于他的主人位置上,而梅德维杰夫则继续坐在来宾位置上;同样,和以往一样,普京第一个开口并占用了大部分谈话时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调笑说,假如还有谁不知道俄国已经完成了权力交接,那么仅从这个场面上,他是决不会猜到有这样的事发生的。克官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谁坐哪个位置并没有明确的仪式性规定,不希望媒体在这个细节上妄加揣测。

之后,普京率先在议会向俄罗斯精英们发表了其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施政演说,内容庞大丰富,涉及政经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国情咨文。而梅德维杰夫面向公众的首次个人演说则被延后。

普京担任总统时,经常亲自提名政府的主要部长和成员,担任总理后更是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政府人事权和很大的行政权。此次新人事变动最重大的决定就是,继续由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舒瓦洛夫出任第一副总理,这其实也在分析家们预料之内。从第二任期开始,普京就开始在自由派和强力部门之间建立只有他才可以掌控的政治平衡。由于伊万诺夫必须留任国防部长,因此另一个第一副总理必然要从自由派经济学家中选出。值得一提的是,舒瓦洛夫此前一直是普京的经济顾问,很可能是在他的建议下,素以自由主义立场和批评现政权而闻名的财政部长库德林才得以留任。强力部门的代表人物,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这次走向了前台,成了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除了继续留

任俄罗斯石油总裁外,谢钦还将担任近两年刚刚重组成功的国有特大型集团公司“俄罗斯造船集团公司”总裁。新政府其他关键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都没有换人。

总之,以两位第一副总理和五位副总理为代表的政府新成员,基本上都是普京的旧盟友。因此,现在俄国新权力中枢已由克里姆林宫转到了总理府所在的白宫,国家的权力中枢仍然处于普京掌控之下。用莫斯科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主席西蒙诺夫的话来说,梅德维杰夫的第一任期恰恰成了普京的第三任期。

新政府权力设置的战略意图也很明显,继续保持自由派职业经理人和强力部门之间的平衡,但对两个集团在经济领域作了明确分工,以舒瓦洛夫为代表的自由派们将继续推进改革,而以谢钦为代表的强力集团们将掌管能源和重工业。

一些分析家认为,普京借着这次新人事变对强力部门作较大调整,是普京有意打破沃科斯基案后克里姆林宫、联邦安全局和司法部门之间形成的紧密的家族式联系,意在削弱该集团在第二任期内过度扩张的权势。比如: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乌斯基诺夫(谢钦岳父)被解职,谢钦另一位得力干将,反毒机构领导人切列索夫因为呼吁合并所有强力部门成为一个单独机构也被暂时解职;持强硬立场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巴特洛舍夫则被调往安全会议,由更温和的波尔基科夫接任。但俄罗斯著名的社会学家克雷塔诺夫斯卡娅不这样认为,她坚信普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强力部门中出现第二个自己,因为“沙皇是不需要同事的,他只需要服从者”。

政权交接后的新人事变只有两个位置被认为是由梅德维杰夫决定的:新任司法部长由其圣彼得堡法律系的同学科纳瓦诺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由其好友邱钦科担任,但其背景仍然是克格勃和俄气公司。因此,从这次新人事变中很难看出,普京对过去八年

乐、默克等大公司相继爆出的财会造假丑闻或申请破产危机,中国的银广夏、蓝田、东方电子、啤酒花、达尔曼等公司违规造假、利用股票融资圈钱、侵占公司资产等事件,以及日本的活力门事件等等,都是公司经理人员利用甚至放大公司制的制度漏洞的结果,也对目前的公司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and 冲击。

这并不是说公司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漏洞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弥补。为了解决现代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就必须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防止代理人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公司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安排,来解决公司财产因所有者与控制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即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尽可能降低代理成本和风险,实现股东价值以及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化。

从公司治理的演化过程看,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激励的目的是使代理人积极为投资者的利益努力工作,使代理人有职、有利、有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使代理人不至于为了有权利而为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要使代理人的职位、权力、利益时刻受到监控和威胁。两者之间的制衡成为公司治理有效与否的关键。失去制衡的公司治理只会有两种结果:或者代理人成为傀儡;或者内部人失控。两者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现代公司治理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自我组织的治理机制,即以利益关系为纽带,以分权、受托、代理、诚信责任、价值实现为内容的机制。所以,自觉地完善公司治理,这是企业能够长期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组织保证。为此,要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健全董事会制度,包括明确董事会的职责,强化董事的诚信与勤勉义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强化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权威性和作用,明确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职权和责任,增加熟悉财务的委员会成员,责成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统筹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财务控制);建立和完善公司绩效评价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透明度,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等。同时政府要充分发挥在完善公司治理的独特作用,如加强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监督,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等等。

总之,公司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公司治理这一根本,就等于抓住了微观经济的要害,对于促进公司运作的公正、透明和效率,抑制公司危机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有任何改变或改变意图,某种程度上他或许希望这个体系能更加现代化和更富有效率,但绝不是取代它。

普京在第一次政府会议上还做出了一项新的重大决定,即以政府主席团的形式取代原来的政府部长例会。新机构主要有总理和副总理及关键部门的部长们组成,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苏联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度。并且普京表示,政府主席团的例会也会邀请相关部长与会。俄宪法规定,政府主席团可以由政府总理为解决个别问题而提出建立,但普京要建立的这个主席团显然是常设性的,此前俄国历届政府还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机构。与政府和杜马的决策制度不同,该主席团的决定将以简单多数通过。不过,根据宪法规定,其任何决定都不得与政府已通过的法令相悖,政府也有权取消该主席团通过的任何决议。此外,俄罗斯总统也有权担任主席团主席。

除了机构重组和人事任免,新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俄罗斯未来三年的社会发展纲要。普京明确提出了以下数字:到2010年,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得低于10%;年平均工资争取达到2.9万卢布;农业生产增长率不得低于4.0%;投资增长率不得低于13%;最低生活线以下人口降到10%以下;失业率降到4.5%;扭转人口下降趋势。普京还重申了他不久前的承诺,对石油工业减税,确保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并要求新政府在将来几个月里必须制定出俄罗斯2020年社会经济远景发展战略。

从梅普组合现有的模式看,普京将掌管国家经济,梅德韦杰夫将作为俄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新元首。但普京任内本身就有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包括:贫富分化的加剧;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经济体制上主要依赖于石油的结构性缺陷;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和强力部门的坐大;司法不够独立;车臣的斯大林式治理和印古什、鞑靼斯坦新的分裂趋向;高加索地带的动荡局势等。由于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是与普京在任内的强国战略相联系的,因此,分析家们怀疑,新政府里的老部长们能否解决这些棘手难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上一个任期内,就已错过了诸多机会。